

• 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

“做正确的事”与“正确地做事”：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编排的影响^{*}

徐祖辉¹ 左明月¹ 周 艳² 刘志阳³

(¹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 南京 210023)

(²嘉兴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01)

(³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 要 数字技术为提升社会创业资源效率提供契机, 使得数字创业团队的构成更加开放化, 但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以及对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过程的影响机制尚未获得系统的探讨与验证。本研究开展 4 项子研究: 挖掘中国情境下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独特内涵与关键维度;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 构建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影响社会创业资源建构的理论模型; 基于合法性视角, 从捆绑方式和时间两维度, 探索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捆绑的演化机制; 基于数字价值创造视角, 从核心主体和支持性主体两方面, 探讨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撬动的动态演化过程。基于资源编排理论的过程视角, 本研究提出数字创业团队是影响资源编排效果的重要因素, 具体而言, 创业者注意力和内外合法性机制提供了指明企业战略目标匹配的资源建构与捆绑过程, 促使社会企业“做正确的事”; 支持性主体协同互动机制提供了规范资源有效率利用的资源撬动过程, 确保社会企业“正确地做事”。

关键词 社会创业, 资源动员战略, 深层文化多样性, 数字创业团队, 资源编排

分类号 B849; C93

1 问题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 坚持共同富裕方向, 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 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快发展智慧农业, 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借鉴商业化手段来解决例

如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新型创业模式, 数字社会创业关注金字塔底层(Bottom of the Pyramid, BOP)群体, 为脱贫问题提供了可持续性解决的新思路, 成为有效实现脱贫地区共同富裕的新方式, 是牵引数字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之一(朱秀梅等, 2020)。在数字化赋能情境下, 数字技术与社会创业活动的结合屡见不鲜, 数字社会创业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可供性、生成性、自组织性和跨界性等特征, 实现社会创业机会—资源智能一体化效应(刘志阳 等, 2020)。例如深圳爱乡宝、薪太软、老爸测评和成都朗力养老等机构通过数字社会创业模式为解决脱贫问题形成可持续发展“造血”机制(刘志阳 等, 2023; 卫田, 万倩雯, 2023)。因此, 从数字经济国家战略和数字社会创业实践两个视角来看, 数字社会创业是引起政府部门、学术界和实践领域极大关注的独特创业现象。

收稿日期: 2024-09-23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402090, 7210210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4YJC63025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ZD144);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重点项目(24CX0303, CX230205);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3GLC007); 浙江省软科学重点项目(2024C25036)。

通信作者: 周艳, E-mail: zhouyan@zjxu.edu.cn

社会创业资源编排强调社会创业企业通过资源建构、资源捆绑和资源撬动等手段构建其竞争优势,其中社会创业资源建构反映的是社会创业企业通过获取、积累有价值资源及剥离无用资源来构建资源组合的过程,社会创业资源捆绑指的是社会创业企业前期通过将获取的资源整合并作用于能力扩大或创造过程,社会创业资源撬动指的是社会创业企业通过将资源组合和能力相连接释放价值资源来实现价值创造过程(Sirmon et al., 2007, 2011)。与商业创业活动相比而言,由于双重价值冲突,多数社会创业活动面临难以被政府部门、投资者、社会公众以及员工等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认同与接纳的合法性障碍,在外部财务资源获取和内部人力资源积累方面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挑战,陷入了自身的资源编排困境(Stephan et al., 2015; Saebi et al., 2019)。根据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牵头开展的三次社会创业专项调查(2017、2019、2021)数据显示:社会创业资源相对匮乏,尤其是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相对有限(刘志阳等, 2020)。因此关注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背后独特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部分社会创业企业通过创业团队成员深层文化异质性策略,增强双重价值信息的敏感性,进而谋求多方资源支持。例如分享收获是一家通过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模式运营的农场,借由团队成员深层文化异质性策略形成的断裂带,进而影响团队成员更迭的发生(田莉等, 2021);随着银巢养老项目社会创业团队成员深层文化异质性的增强,一方面通过政府部门、商业企业和慈善基金会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寻求资源,另一方面在团队内部加强人力资源的创新性整合,从而实现团队资源编排最大化(袁彦鹏等, 2022)。

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跨区域、跨领域地组建数字创业团队,主要负责社会创业企业数字化战略决策和数字化企业运营,整合数字社会创业资源,成为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过程的一大助力(刘志阳等, 2020; 朱秀梅等, 2020; 贾建锋, 刘梦含, 2021)。比如深圳市联谛信息无障碍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无障碍行业的先行者,组建培育了一支集“障碍者

+IT 工程师+无障碍专家”三个身份于一身的残障工程师专业团队(尹珏林等, 2022)。所以说,实践中社会创业者们对数字创业团队具有强烈的认知,强调不同文化背景、社会身份和知识经验的个体通过组建例如虚拟创业团队等数字创业团队的表现形式,进而在社会创业企业资源编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梳理社会创业资源开发的研究发现,现有研究对社会创业企业例如资源拼凑和资源优化等资源动员手段的概念、特征、类型和结果等方面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究,相对忽视了社会创业资源获取的议题,尤其对创业团队和数字技术交互层面形成的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如何影响社会创业资源编排效应讨论不足。比如,这些研究并没有阐述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本质内涵与结构维度,较少去探讨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如何影响例如资源获取等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过程。与商业创业活动相比而言,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过程具有自身特殊性,例如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合法性地位危机、保持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平衡而不是仅仅关注经济价值,这也暗示着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背后存在着独特的作用机制。比如什么维度的深层文化多样性有利于社会创业资源编排,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编排是否存在双刃剑效应?因此,深入揭示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企业成长的内在逻辑与基本规律,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据此,本研究拟考察社会创业企业所具有的数字创业团队文化差异性构成策略,探究它们如何通过资源编排过程来实现快速成长,以及如何在与政府部门、数字用户、高校及科研机构、投资机构和创业服务机构等支持性主体的互动过程中获取竞争优势,减少使命偏离风险来促进持续增长。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基于资源编排、注意力基础观、合法性和数字价值创造等理论视角,首先构建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理论框架,识别与提炼其核心内涵、关键维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情境特征;其次从注意力基础观理论视角来探讨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不同维度驱动社会创业资源建构的形成机制;再次从合法性理论视角来分析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捆绑的演化机制;最后从数字

价值创造理论视角来研究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撬动的动态演化规律。通过这些研究,本文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社会创业者和支持性主体部门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社会创业资源与团队

2.1.1 社会创业资源视角

从社会创业资源来看,借鉴蔡莉等(2019)关于创业资源开发过程的定义,目前研究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关于社会创业资源的获取,另一方面是探讨资源动员的战略(卫田,万倩雯,2023)。从社会创业资源的获取角度来看,郑刚等(2022)研究发现了中国情境下社会企业的合法性构建过程和相应策略,归纳了社会企业随着制度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合法化策略的动态模型;葛笑春等(2021)基于“逻辑冲突—行为策略—资源识取”的逻辑链条,揭示非营利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过程中政府、公益和市场三种不同制度逻辑在特定时空场域中的冲突与融合以及组织的战略回应;汪建成和林欣(2021)基于资源基础观,剖析了资源识别与选择、资源获取、资源激活与再造等社会创业资源整合三个阶段过程;何波等(2020)基于资源构建视角,探讨BOP战略实施中跨部门伙伴关系的构建过程,认为资源构建的过程包括资源筛选、资源激活、资源获取和资源整合四个阶段;万倩雯等(2019)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解锁了企业社会创业家与当地个体合作者之间合作关系的构建及演化过程;陈昀和陈鑫(2018)认为,合法性是社会创业企业与社会公众共同建构的结果,修辞策略和产品策略是社会企业获取道德合法性和实用合法性的有效策略,且会受到来自身份构建、情境嵌入、发展阶段等环境因素的显著影响;厉杰等(2018)从社会创业合法性形成机制的前因变量、策略及情境条件3个方面,多角度归纳社会创业合法性的形成机制,构建了社会创业合法性研究框架;Zhao和Lounsbury(2016)认为一个国家市场支持的制度环境不仅有利于小额信贷组织商业资本的获取,而且有利于自身公共资本的获取。

从社会创业资源的动员角度来看,社会创业企业主要通过资源拼凑和资源优化手段进行资源动员战略。卫田和万倩雯(2023)构建了基于社会资

本的社会创业企业持续双重价值创造整合模型,提出了4种资源优化战略,并强调社会资本是资源拼凑的核心要素;刘振等(2019)基于资源拼凑理论视角,以典型社会企业为案例研究对象探究社会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的内在机制问题;彭伟等(2019)构建了先前经验、社会网络、市场导向、创业导向和环境包容性影响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的理论模型;彭伟等(2018)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资源拼凑有助于社会创业企业获取不同的组织合法性,进而促进其成长。

2.1.2 社会创业团队视角

与一般创业团队相比而言,社会创业团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徐虹等,2020;田莉等,2021)。袁彦鹏等(2022)认为社会创业团队的集体心理倾向性是团队生成韧性的基础要素,韧性表现为资源韧性、价值韧性、创业韧性等特征;Lazzarini(2020)研究发现社会创业团队通过积极推动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动态平衡来促使社会企业获得组织合法性和可持续发展;Battilana等(2015)认为双重价值融合使得社会创业团队内部面临更尖锐的管理冲突。

社会创业团队中创业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人格特点会对创业行为及结果产生影响。从人口统计学特征来看,一些文献主要探讨的是创业身份(袁彦鹏等,2020;张伟等,2022)、从军经历(Xu et al., 2022)、个人关键事件(厉杰,孙瑞杰,2020)、个人创伤(仇思宁,李华晶,2019)、贫困经历(陈良勇等,2022)、教育经历(Hörisch et al., 2017)、价值观(Stevens et al., 2015)、创业经历(Estrin et al., 2016)和性别(Hechavarria et al., 2017)如何影响社会创业活动或者结果。从人格特点来看,现有文献主要探讨的是亲社会动机(刘振等,2021;汪忠,程铭,2022)、失败恐惧感(张坤,张秀娥,2023)、自我效能感(Hockerts, 2017)等因素对社会创业活动或者绩效的影响。详见图1所示。

2.2 创业团队异质性

2.2.1 创业团队异质性的内涵与分类

聚焦到创业情境,创业团队异质性指的是创业团队成员在年龄、性别、种族、国籍、语言、教育水平、创业经验等易于观察的表层多样性方面以及认知、偏好、人格特点、价值观、信仰等不易观察的深层多样性方面体现的差异化(胡望斌等,2014; Saud Khan et al.,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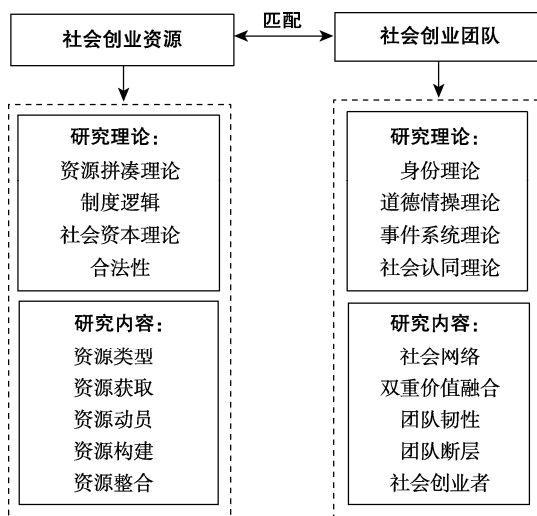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创业研究视角的理论框架

结合创业情境的特点,创业团队异质性的分类大多沿袭团队异质性的分类标准。例如 Finkelstein 和 Hambrick (1990)认为团队异质性包括人口统计学异质性(年龄、性别、种族等)和深层特质异质性(技能、经验、认知观念、价值观等); Williams 和 O'Reilly (1998)提出团队异质性包括低工作相关异质性(性别、年龄、种族等)和高工作相关异质性(教育和经验异质性); Jehn (1999)提出将团队异质性划分为社会类别异质性、信息异质性和价值观异质性; Harrison 等(2002)提出年龄、性别、种族等异质性属于浅层异质性,又称为高可见度异质性或外部异质性,而人格特质、价值观、态度、偏好和信念等方面的差异性则属于深层异质性;胡望斌等(2014)则认为年龄、性别、教育水平等差异性反映的是创业团队社会多样性,而行业经验、职能经验等异质性则体现为创业团队功能性多样性;刘刚和王泽宇(2016)认为创业团队文化多样性包括创业团队成员的性别、种族和国籍(或所在地区)的差异性;龙静等(2020)从创业团队成员专业技能、行业经验和教育背景三方面的差异性来测量创业团队异质性;马鸿佳、唐思思和郑莉莉(2022)认为创业团队多样性包括社会类别多样性、信息多样性和价值观多样性;曾楚宏和李敏瑜(2022)认为创业团队异质性包括经验异质性和价值观异质性两个维度。

通过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创业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异质性(年龄、性别、种族和国籍等)和

任务相关的异质性(教育背景、功能背景、工作背景、工作经验、行业经验和专业知识等)备受关注,其中性别、种族和国籍等差异性属于浅层文化异质性。

2.2.2 创业团队异质性对创业企业资源影响的双刃剑效应

一方面,实证研究总体证实了创业团队异质性对创业企业资源的正向影响关系。例如马鸿佳、唐思思和郑莉莉(2022)认为创业团队社会类别多样性和信息多样性将有助于知识共享,而创业团队价值观多样性不利于知识共享;袁彦鹏等(2022)认为在逆境/危机情境触发下,通过团队内个体间互动过程(团队内部关系建构)和团队与外部互动过程(社会关系网络利用)强化团队内部合作与外部资源获取和利用能力;曾楚宏和李敏瑜(2022)研究发现在组建创业团队时要有意识地保持成员在知识技能、专业职能等经验方面的多样化和互补性,从而获得成长所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Xu 等(2023)研究发现“无我”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使创业团队中的创业者能够将更多的注意力分配到与政府官员、银行家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外部活动上,增强了具有传统文化特征的创业者在这些利益相关者眼中的社会政治合法性,使他们能够进行信息交流和获得政治渠道,从而获得银行贷款等外部资源。

另一方面,创业团队异质性对创业企业资源的影响存在倒 U 形关系或者负向关系。例如刘刚和王泽宇(2016)研究发现创业团队文化异质性对互联网创业融资绩效的影响存在倒 U 形关系,创业团队教育与创业经验的提升能够降低创业团队文化异质性对互联网创业融资绩效的影响;赵文红和薛朝阳(2017)研究发现创业团队异质性对认知合法性影响呈倒 U 形关系,适度的创业团队异质性有利于建立创业企业认知合法性,进而获取创业所需的资源;田莉等(2021)研究发现创业团队成员身份异质性会诱发团队内形成平衡型和非平衡型断裂带,其中平衡型断裂带使创业团队容易产生合作式冲突,提高了团队成员间的凝聚力,从而降低了团队人力资源更迭概率,非平衡型断裂带使创业团队容易产生让步式冲突,进而导致了团队人力资源更迭的发生; Triana 等(2021)认为创业团队深层异质性导致团队成员内部冲突,进而可能引起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失。详见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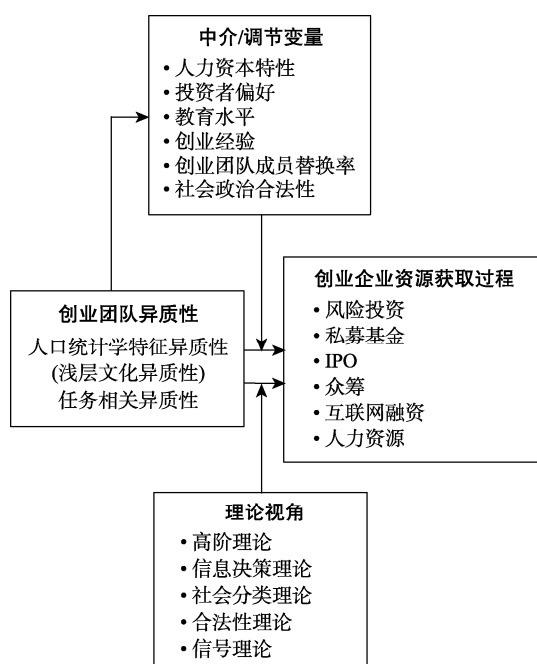


图2 创业团队异质性对创业企业资源影响的研究脉络图

2.3 资源编排理论

2.3.1 资源编排理论的内涵与核心思想

来源于资源管理模型(Sirmon et al., 2007)和资产编排模型(Helfat et al., 2009),资源编排理论认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资源、能力和管理者能力的组合关系,强调通过资源建构、资源捆绑和资源撬动等手段构建其竞争优势(Sirmon et al., 2007; 2011)。其中,资源建构即资源结构化(Structuring),指的是企业通过获取、积累有价值资源及剥离无用资源来构建资源组合的过程;资源捆绑即资源能力化(Bundling),指的是企业前期通过将获取的资源整合并作用于能力扩大或创造过程;资源撬动即资源杠杆化(Leveraging),指的是企业通过将资源组合和能力相连接释放价值资源来实现价值创造过程。

与资源拼凑和资源动员相比较,资源编排理论被看作一种过程导向的资源观视角(张青,华志兵,2020),其核心思想主要包括:第一,阐述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厘清资源与能力之间的动态作用关系;第二,体现协同性、权变性和动态性的资源管理思维;第三,资源编排流程具有一般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特征;第四,资源编排被认为一种组织层面的资源管理能力(Sirmon et

al., 2011; 张青,华志兵,2020)。

2.3.2 资源编排理论在创业领域的应用研究

与成熟企业相比而言,创业企业普遍面临着“新进入缺陷”和“小企业缺陷”,更加需要创业者/创业团队灵活地编排资源,进而保证稀缺资源得到高效地利用,因此资源编排理论是揭示创业企业成长的重要理论之一(张青,华志兵,2020)。从组织层面来看,学者们主要探究高管团队注意力(王世权等,2022)、资源编排模式(贾竣云等,2023)、资源和能力的有效组合(马鸿佳等,2024)和数字技术特征(刘志阳等,2023)。从组织间层面出发,学者们提出多主体资源编排的过程包括资源的共享、转化和协调以及资源更新(杨亚倩等,2024)。资源编排过程主要对企业价值创造(贾竣云等,2023; 杨亚倩等,2024)、创业企业成长(Zeng et al., 2023)、社会创新结果(刘志阳等,2023)、商业模式创新(韵江等,2022)、战略更新(王世权等,2022)、创业企业绩效(邓渝,2021)、创新柔性(赵慧娟等,2022)和创业模式(牛璐等,2023)产生重要的影响。详见图3所示。

2.4 相关研究评述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创业资源、创业团队异质性以及资源编排理论相关研究已形成了一些具有开拓性的框架体系与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但在整体上还呈现以下不足:

第一,有关社会创业资源开发过程研究的理论层面较为单一。社会创业资源开发过程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探讨例如资源拼凑和资源优化等资源动员的手段,二是社会创业资源的获取过程。目前相关研究对前者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究,相对忽视了后者的相关议题。而随着社会创业企业的成长,数字经济情境下数字创业团队对其生存和发展显然不可或缺。基于此,本研究以后者为突破口,将社会创业资源获取过程研究扩展到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过程,通过注意力基础观、合法性、数字价值创造和资源编排等理论视角,在创业团队与数字技术交互层面揭示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过程。

第二,现有研究较少探究创业团队层面的深层文化异质性,也忽略了数字经济情境下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异质性对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过程的影响。以往有关创业团队异质性研究主要基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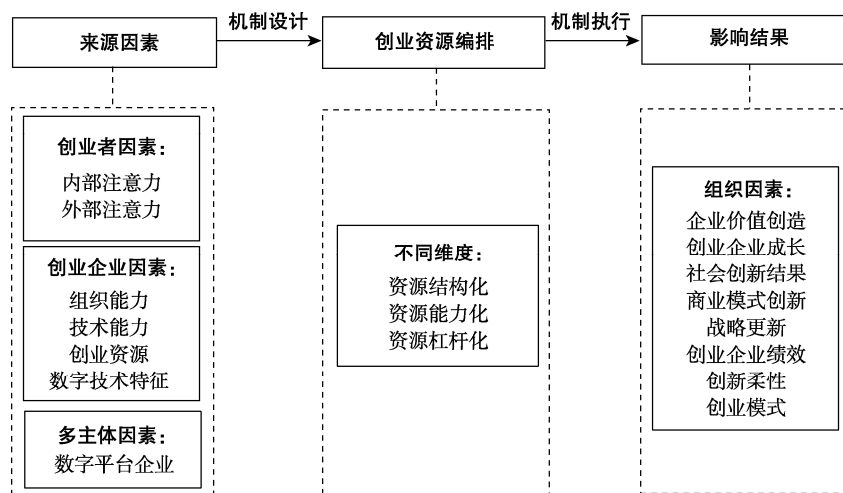


图3 资源编排理论在创业领域应用研究的理论框架

高阶理论、信息决策理论、社会分类理论、相似吸引理论、合法性理论和信号理论等理论视角,探讨例如性别、种族和国籍等浅层文化异质性更多地对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等方面发挥着双刃剑效应。现有文献较少关注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异质性以及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过程的影响,也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下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异质性的本质内涵与结构维度。

第三,立足数字社会创业情境下资源编排研究较为匮乏。以往资源编排过程研究主要集中于商业创业企业,理论探讨资源编排过程和特征,创业者因素、创业企业因素以及多主体因素对创业企业资源编排过程的影响。然而对于合法性不足和双重价值冲突的数字社会创业情境特征下,尤其是比如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异质性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下社会创业资源编排的诱发机制,如数字创业团队等核心主体和比如政府、数字用户和中介机构等支持性主体交互影响的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过程研究仍然处于较为匮乏的状态。

3 研究构想

本研究在考虑社会创业资源编排面临更加强烈的合法性不足和双重价值冲突,结合资源编排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合法性以及数字价值创造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视角对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过程及作用机制进行研究。本研究内容将围绕四个模块进行展开,模块1是整体研究的基础性内

容,重点在于厘清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自身内涵与情境特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模块2承接模块1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探讨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的影响机制,解决“为什么”的问题;模块3将研究理论视角投放于内外部合法性,在模块1和2的基础上,考察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捆绑过程的影响机制;模块4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把这些过程置于数字价值创造理论视角研究框架下,解析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撬动的作用效果与影响机制。图4所示为本研究的总体理论框架,这四个模块内容共同构建了整体的研究图景。

3.1 模块1: 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探索性分析

本模块以数字社会创业团队作为研究对象,挖掘深层文化多样性的独特内涵与过程,并提取深层文化多样性的关键维度,同时我们认为这种深层文化多样性具有独特的中国情境特征,是其能够形成与发展的催化因素。

3.1.1 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内涵

数字创业团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共同社会使命,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数字创业活动且拥有一定股权的人所组成的团队,创业团队成员主要负责企业数字化战略决策(刘志阳等,2020;贾建锋,刘梦含,2021)。数字创业团队文化多样性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所共同组成的(程江,2017)。随着数字技术注入创业的各个领域,越来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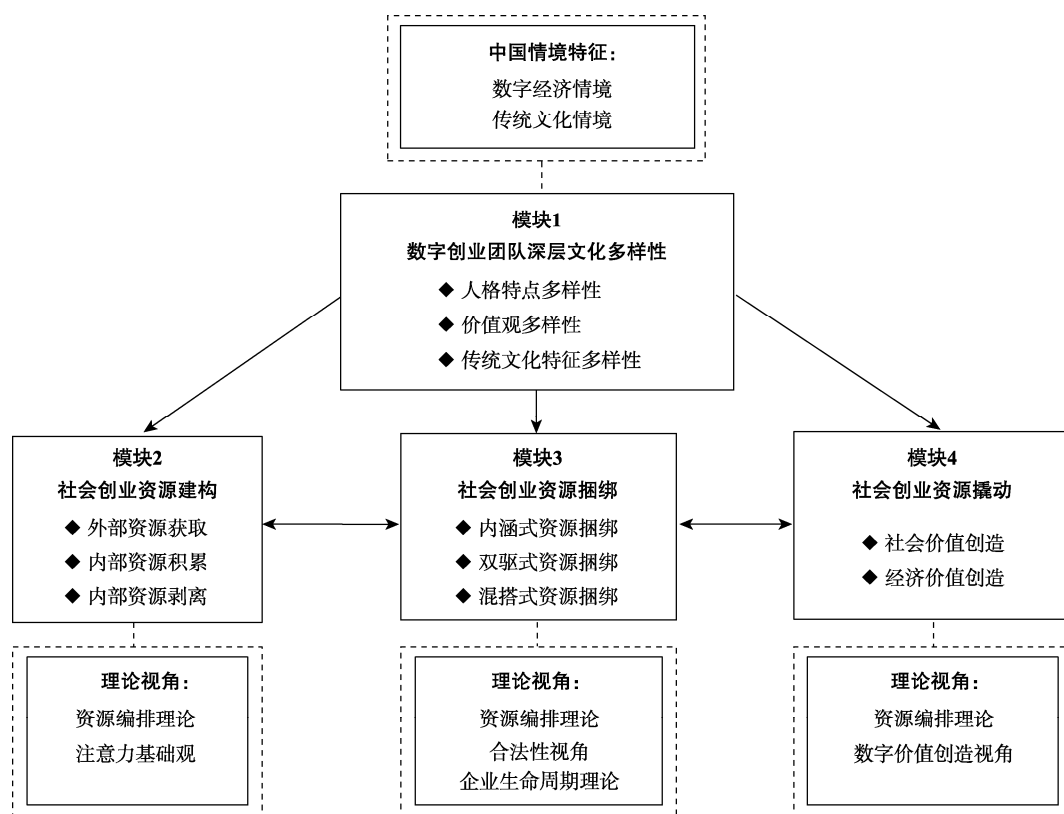


图4 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创业资源编排的研究框架

越多的数字创业企业开始从全球范围内组建团队成员,因此数字创业团队中的文化多样性问题备受关注,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总体而言,基于数字社会创业企业与文化层面的双重属性,本研究拟将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内涵表述为:数字创业团队成员间在人格特点、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特征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程度,这一层面的特征通常不易直接观察,需要选择比较合适的测量方式,与基于认知特征的深层文化多样性相类似。

3.1.2 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关键维度

本研究发现,在开放性、可供性和可再生性的数字经济情境,以及高集体主义文化、高不确定性规避、高权力距离和高关系利用倾向性的传统文化情境下,创业团队构成呈现开放化、创业团队认知具有能动化以及创业团队管理更具智能化的情境特征。本研究将对这些情境特征及其与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内在关联展开进一步探索。

综合 Harrison 等(2002)以及 Triana 等(2021)研究可以发现,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主要包括人格特点、价值观和文化等维度。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情境,本研究初步提炼和构建了人格特点、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特征等三个关键维度来表征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详见图5所示)。其中,第一,人格特点多样性。数字创业团队人格特点多样性指的是数字创业团队成员间在例如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经验开放性和神经质等人格特点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程度。第二,价值观多样性。数字创业团队价值观多样性指的是数字创业团队成员间在例如工作和生活等相关的价值观方面存在着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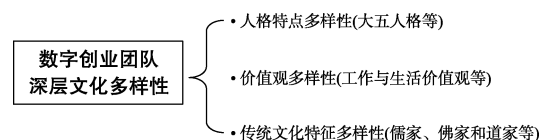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下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维度

显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程度。第三,传统文化特征多样性。数字创业团队传统文化特征多样性指的是数字创业团队成员间在例如儒家、佛家和道家等传统文化特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多元化和差异性程度。

3.2 模块 2: 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的影响机制

本模块基于注意力基础观主要探讨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之间的作用机制,首先辨析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之间的总体关系,其次探索创业者注意力配置对象的中介机制。图6所示为本模块的研究框架,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理论视角展现了“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创业者注意力—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这一完整逻辑关系。

3.2.1 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

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反映的是社会创业企业通过获取、积累有价值资源及剥离无用资源来构建资源组合的过程(Sirmon et al., 2007; 2011)。借鉴 Wernerfelt (1984)对资源的划分方式,结合社会创业研究情境,本研究将社会创业资源分为财务(公共性、商业性和慈善性)、物质(工厂和设备等)、人力(志愿者员工技能和知识)、混合性组织

(企业能力、控制、政策与文化)和关系(与双重价值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等。基于合法性的理论视角,本研究重点关注外部财务资源和内部人力资源两个维度(蔡莉等, 2019; 汪忠等, 2019)。社会创业外部财务资源分为公共性、商业性和慈善性三种类型(Zhao & Lounsbury, 2016),公共性社会创业外部财务资源指的是创始人在社会创业过程中所建构的例如政府农村扶贫补贴等政府部门的资金,商业性社会创业外部财务资源指的是创始人在社会创业过程中所建构的例如银行批发贷款、资产证券化融资和股权融资等金融机构和风险投资部门的资金,慈善性社会创业外部财务资源指的是创始人在社会创业过程中所建构的例如社会捐赠和公益创投等非营利部门的资金。社会创业内部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积累活动和人力资源剥离活动,内部人力资源积累活动具体表现为社会创业企业志愿者员工规模的提高,内部人力资源剥离活动是指剥离那些对社会创业使命不认可的人力资源过程,表现为员工社会创业退出(Sirmon et al., 2007; 汪忠等, 2019; 王世权等, 2022)。

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会受到深层文化多样性的影响,本部分主要从人格特点、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特征三个维度来考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影响,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总体上有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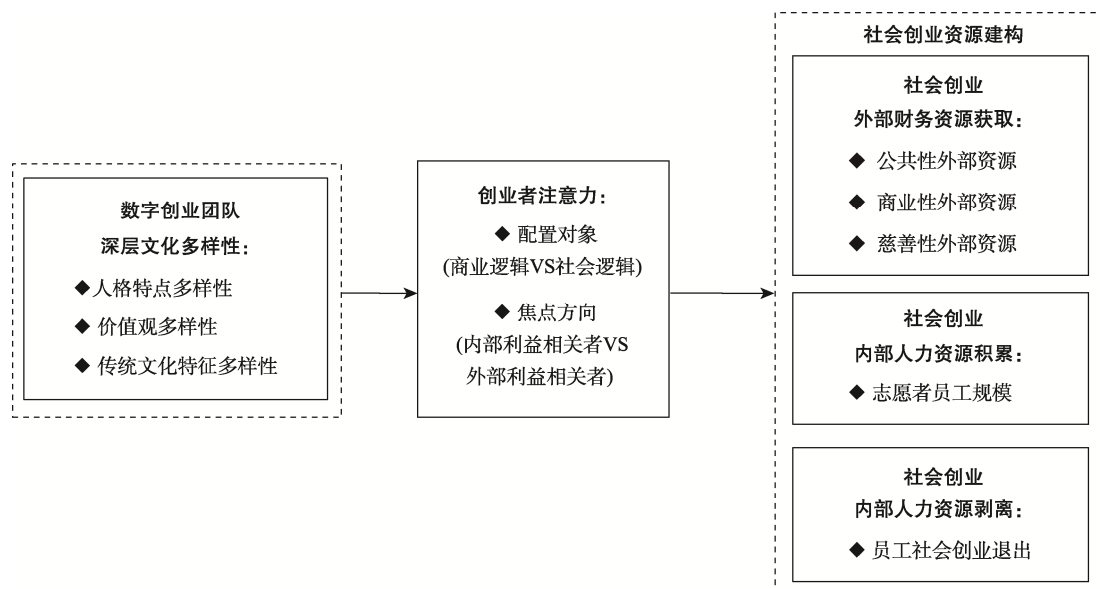


图6 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的研究框架

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提升能够有力地提高社会创业团队把握双重价值利益相关者多元深层文化需求的能力,为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带来促进作用;但随着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提升,尤其是传统文化特征多样性不仅增加数字社会创业团队成员的多元深层文化合作成本,双重价值利益相关者社会认同和自我归类效应也开始显现,双重价值利益相关者更倾向于与深层文化多样性较为单一且传统文化背景与自己类似的数字社会创业团队成员进行合作。比如相同人格特点、价值观和共同传统文化特征的创业者更有可能产生社会信任关系(Xu et al., 2023),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建构的不利影响也因此产生。在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较低的情况下,文化多样性满足双重价值利益相关者多样性需求所带来的边际社会创业资源建构提升往往高于社会认同差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提升,双重价值利益相关者深层文化多样性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所带来的边际社会创业资源建构效应不断降低,但其社会认同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创业资源建构影响却不断扩大,尤其是价值观多样性不利于数字创业团队社会认同的实现(马鸿佳,唐思思,郑莉莉,2022)。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建构的总体边际效应不断降低,直至特定的转折点,出现负向的边际影响。

据此,本研究提出命题 1: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总体上具有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即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的转折点后逐渐降低,呈现“倒 U 型”的曲线关系。

3.2.2 创业者注意力配置对象的作用机制

注意力基础观展现了“数字创业团队特征—创业者注意力—创业企业行为”这一完整链条,系统地揭示了数字创业团队特征通过创业者注意力配置来决定着创业企业的战略决策行为(Ocasio, 1997; 张明等, 2018)。注意力基础观着重探讨了注意力焦点(Focus of Attention),指的是企业家做出什么决策取决于自身所关注的议题及其解决方案(刘景江,王文星,2014; 张明等, 2018; Xu et al., 2023)。创业者注意力焦点指

的是创始人所关注的创业议题和方案,具有选择性、持续性、平衡性和冲突性的特征(吴建祖等, 2009; 吴建祖, 龚敏, 2018)。聚焦到社会创业情境中,创业者注意力配置对象包括商业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商业性的创业者注意力配置对象更加关注经济价值,因此商业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社会性的创业者注意力配置对象更加关注社会价值,因此社会逻辑占据主导地位(刘振等, 2019, 2021)。创业者注意力的平衡性指的是当创始人面对双重价值的创业目标时,会把注意力同时配置给与商业逻辑和社会逻辑有关的创业任务;创业者注意力的冲突性则反映的是当创始人面对商业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创业目标时,无法把注意力同时配置给与双重价值有关的创业任务。

当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没有导致创始人将注意力配置对象放在社会创业企业双重价值目标上面,即双重价值目标的创业者注意力平衡性和冲突性较低时,深层文化多样性也就不会对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产生影响。从创业者双重价值注意力平衡性视角来看,例如一方面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人格特点维度能够丰富外部社会网络关系,使得创始人对于商业逻辑的创业注意力关注程度越深;另一方面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传统文化特征维度能够关注社会创业企业中的志愿者员工发展、BOP 产品创新和社会使命稳健性,使得创始人对于社会逻辑的创业注意力关注程度越深。相反,从创业者双重价值注意力冲突性视角来看,如果数字创业团队成员在深层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维度中有明显的观念差异而产生隔阂和冲突,创始人的双重价值注意力整合过程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社会创业资源建构过程。

据此,本研究提出命题 2:数字创业团队利用深层文化多样性来改变创业者注意力配置过程(双重价值的冲突性与平衡性),从而影响社会创业资源的建构过程。

3.3 模块 3: 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捆绑过程的影响机制

本模块主要探讨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创业资源捆绑过程之间的作用机制,首先提炼与辨析资源编排理论视角下社会创业资源捆绑的演化路径;其次,探索数字创业团队深层

文化多样性如何驱动社会创业资源捆绑的演化路径,即在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不同维度的作用下,社会创业资源捆绑过程将呈现出怎样的演化路径?图7所示为本模块的研究框架,基于合法性理论视角展现了“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内外部合法性—社会创业资源捆绑”这一完整逻辑关系。

3.3.1 资源编排理论视角下社会创业资源捆绑的演化路径辨析

社会创业资源捆绑指的是社会创业企业前期通过将获取的资源整合并作用于能力扩大或创造过程(Sirmon et al., 2007; 2011)。根据 Sirmon 等(2011)对资源捆绑类型的划分,围绕资源提供主体差异,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捆绑可分为内部资源维持、外部特定利益相关者资源丰富和外部利益相关者资源开拓。第一,内涵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内涵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反映的是社会创业资源绝大多数来自例如志愿者员工等社会创业企业内部,呈现“社会创业企业内部资源维持为主”的演化规律;第二,双驱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双驱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指的是社会创业资源主要来自社会创业企业内部以及与例如政府部门等社会创业企业关系密切的唯一利益相关者,呈现“社会创业企业与外部单一价值利益相关者资源丰富为主”的演化规律;第三,混搭式社会创业资

源捆绑。混搭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意味着社会创业资源来自例如金融机构、非营利组织和数字用户等更广泛的双重价值利益相关者,呈现“社会创业企业与外部双重价值利益相关者资源开拓为主”的演化规律。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创业企业成长具有明显的周期阶段性,可以界定为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阶段(郑刚等, 2022)。结合社会创业企业的独特特点,本研究分成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初创期。这一发展阶段的社会创业企业往往缺乏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可以利用、整合和开发其所掌握的稀缺资源,进而提升资源利用的整体效率(彭伟等, 2018)。第二、成长期。处于成长阶段的社会创业企业资源约束依然较大,普遍缺乏研发创新经验且社会创新成功率不高,而且难以享受到政府部门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徐虹等, 2020)。第三、成熟期。此阶段社会创业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利润的持续增长,避免发生企业风险转向衰退期(刘振等, 2019)。

因此,本研究将综合资源捆绑方式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视角,提出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捆绑演化路径分为两个维度,在资源捆绑方式维度上则包括内涵式、双驱式和混搭式;在时间维度上遵循着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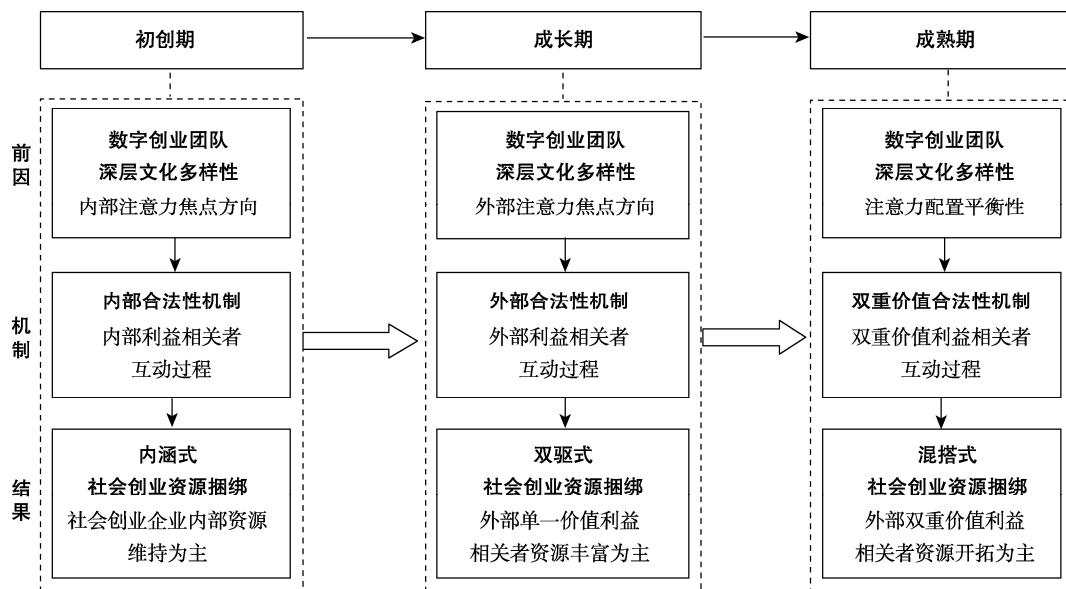


图7 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创业资源捆绑过程的研究框架

3.3.2 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捆绑过程的演化机制

总体而言,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创业资源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马鸿佳,唐思思,郑莉莉,2022;袁彦鹏等,2022;Xu et al., 2023),但是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不同维度对社会创业资源捆绑产生的不同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索。基于合法性理论视角,社会创业内部合法性指的是社会创业者和社会创业项目获得诸如员工等社会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主要包括社会逻辑和商业逻辑两个维度;外部合法性指的是社会创业者和社会创业项目被外部利益相关者如政府和其他公司认可,包含社会逻辑和商业逻辑两个维度(Zimmerman & Zeitz, 2002; 万倩雯等, 2019)。基于前文对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维度和社会创业资源捆绑演化路径的辨析和提炼,本研究拟提出如下机制:

初创期的社会创业企业由于企业规模较小,自身资源与能力有限,只能依靠内部资源获得稳定成长,此时创业者关注的重点在于企业内部。创业者内部注意力焦点的选择性指的是当创始人面对创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时,会把注意力焦点放在例如员工发展、组织发展和产品开发等与创业内部利益相关者有关的任务(Stevens et al., 2015; 王世权等, 2022)。创业者内部注意力焦点的持续性反映的是创始人按特定顺序对多重创业内部利益相关者持续施加注意力。从内部合法性理论视角来看,一方面,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传统文化特征维度通过社会认同效应使创始人更多地注意力焦点放在与多样性的内部志愿者员工互动上面,从而通过提升内部合法性地位来积累与整合更多的例如志愿者员工规模等社会创业企业的内部资源;另一方面,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人格特点维度能够满足双重价值内部利益相关者的多元深层文化需求,促使创始人分配更多的注意力与多个部门负责人等内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内部活动中的互动,整合了通过深层文化多样性所获取的人力资源,通过团队内部高效的个体互动过程来减少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剥离,进而推动内涵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方式的形成。

因此,本研究提出命题3:在初创期,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主要通过内部合法性机制

驱动内涵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即:恰当的数字创业团队人格特点多样性、价值观多样性和传统文化特征多样性有利于获取生存所需要的内部合法性,实现内涵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

此阶段的社会创业企业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创业资源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因此,年轻的社会创业企业更倾向于采用组建多样性的深层文化数字创业团队来获得外部合法性地位进而取得更大的成长。创业者外部注意力焦点的选择性指的是当创始人面对多重创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时,会把注意力重点配置给与创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有关的任务。创业者外部注意力焦点的持续性反映的是创始人按特定顺序对多重创业外部利益相关者持续给予注意力。从外部合法性理论视角来看,一方面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传统文化特征维度提供了数字创业团队成员与多样性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实现有效沟通的信息渠道,能够使创始人更多地注意力焦点放在与具有相同传统文化特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上面,进而通过提升外部合法性地位来获取与整合更多的例如政府补贴、银行贷款和社会捐赠等社会创业的外部财务资源;另一方面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价值观维度使得数字创业团队成员能够与社会创业企业内部不同员工进行有效的互动,满足他们多样性的深层文化需求,进而让创始人将更多的注意力分配到与政府官员、银行家和非营利部门负责人等特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外部活动上,增强了具有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创始人在这些利益相关者眼中的合法性,使他们能够进行信息交流和获得政治渠道,进而获取和整合社会创业外部财务资源,从而实现双驱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方式。

因此,本研究提出命题4:在成长期,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主要通过外部合法性机制驱动双驱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即:恰当的数字创业团队人格特点多样性、价值观多样性和传统文化特征多样性有利于获取发展所需要的外部合法性,实现双驱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

这个时期,社会创业企业的管理机制和技术创新已经比较成熟,内外部合法性地位比较高,创业资源也相对比较宽裕,然后也面临着社会创业机会有效性不足,技术手段固化以及企业双重

价值冲突等问题(Zhao & Lounsbury, 2016; 汪忠等, 2019; 刘志阳 等, 2020)。此时社会创业企业组建数字创业团队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平衡双重价值的合法性来降低企业使命偏离的风险,一方面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使得创始人与商业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们持续互动,通过保持创业者双重价值合法性来实现混搭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另一方面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因为价值观差异而引起双重价值的冲突性,创始人的双重价值合法性重构过程会受到影响,进而损害混搭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方式。

因此,本研究提出命题5:在成熟期,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主要通过双重价值合法性机制驱动混搭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即:恰当的数字创业团队人格特点多样性、价值观多样性和传统文化特征多样性能够影响双重价值合法性的平衡性和冲突性,从而降低企业使命偏离风险,实现混搭式社会创业资源捆绑。

3.4 模块4: 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资源撬动过程的作用效果

本模块主要探讨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创业资源撬动过程之间的作用机制,首先提炼与辨析社会创业企业双重价值创造的动态演化过程;其次,探索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如何驱动社会创业企业双重价值创造演化机制,即在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不同维度的作用下,社会创业资源撬动过程将呈现出怎样的演化路径?图8所示为本模块的研究框架,基于数字价值创造多主体互动理论视角展现了“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支持性主体协同互

动—社会创业资源撬动”这一完整逻辑关系。

3.4.1 社会创业企业双重价值创造的动态演化过程

社会创业资源撬动指的是社会创业企业通过将资源组合和能力相连接释放价值资源来实现价值创造过程(Sirmon et al., 2007, 2011)。价值创造过程指的是以有形和无形的形式来满足需求或提供利益的任何商品、服务或行为(贾竣云 等, 2023; 卫田和万倩雯, 2023)。数字价值创造指的是通过数字技术的组合利用来触发企业价值创造各环节的改变,进而实现整个生态系统中多主体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过程,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持续的竞争优势(Amit & Han, 2017; 孙新波 等, 2021)。聚焦到数字社会创业研究情境中,社会创业价值创造包括社会价值创造与经济价值创造两方面内涵,包含着数字组件、数字平台和数字基础设施等3种数字社会创业表现形式(刘志阳 等, 2020),社会价值创造涉及到社会创业企业社会绩效、BOP人群收入提升、能力提升和关系拓展等企业和个人两个层面,经济价值创造指的是商业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商业资源的引入、商业能力的提升、数字商业创业生态的拓展、社会创业企业经济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刘志阳 等, 2023; 卫田, 万倩雯, 2023)。

基于数字价值创造理论视角,社会创业企业双重价值创造的动态演化主要包括价值创造的资源提供主体、价值创造的资源相关性程度、价值创造方式和价值网络关系等四个维度(孙新波 等, 2021; 卫田, 万倩雯, 2023)。具体来看,数字创业背景下,随着数字社会创业企业的成长,更多地依赖于数字生态系统,实现价值创造的是多维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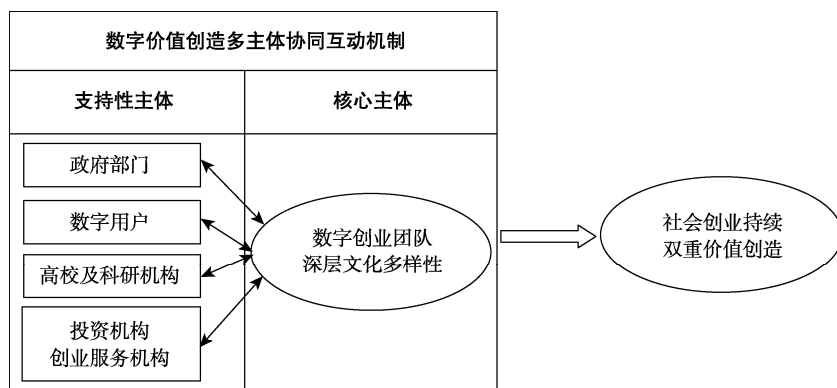


图8 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创业资源撬动过程的研究框架

源提供主体,直接与间接并存的企业资源相关性,围绕着数字创业平台资源进行资源编排,通过内部模块化创新与外部分布式、开放式创新社区等创新型价值创造方式来构建多主体共创、共享和共生的价值网络关系。

3.4.2 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对社会创业双重价值创造的演化机制

根据数字价值创造多主体协同互动视角(马鸿佳,林樾,肖彬,2022;朱秀梅,杨姗,2023),本部分构建的社会创业企业双重价值创造驱动模型中的多主体分为核心主体和支持性主体,前者是数字经济情境下社会创业企业的行为执行主体——数字社会创业团队,后者是包括政府、数字用户、高校及科研机构、投资机构和创业服务机构等对数字社会创业企业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性作用的主体。这几大支持性主体在数字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角色和责任。

(1)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社会创业企业中的创业团队能够发挥人力资本的核心主体作用,进而实现持续双重价值创造。人力资本主要包括一般人力资本和特定人力资本两种类型,其中一般人力资本主要指的是教育背景,然而特定人力资本反映的是创业者所具备的创业/行业经验、理论知识和创业能力等(Estrin et al., 2016; 彭伟等, 2022)。聚焦到社会创业资源研究领域,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作为特定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发挥着核心主体的作用,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开放性特征有利于社会创业团队构成的开放化,吸引更多深层文化多样性的成员加入到创业团队中,形成深层文化多样性的数字创业团队(贾建锋,刘梦含,2021);另一方面,数字生态系统作为在线社会资本,具有恰当的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能够高效地建构和捆绑系统内的专业知识、资源和意见来优化社会创业企业的数字战略决策,进而有效地实现持续双重价值创造。因此,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可能对提高社会创业企业持续双重价值创造有重要作用。

(2)政府部门。政府通过发挥政府支持的引导性作用来驱动社会创业企业持续双重价值创造。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制度支持与制度缺失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视角来探讨政府对社会创业的影响,其中制度支持的理论视角认为积极的政府支持能够为社会创业企业提供更多地资源和信息,通过

获取合法性地位来参与更多地社会创业活动(Stephan et al., 2015; 刘振等, 2019);制度缺失的理论视角认为政府支持的缺失环境中,尤其是贫困等社会问题突显下,将会激发个体层面的同情心,从而促使他们参与社会创业活动(Estrin et al., 2013; Hoogendoorn, 2016)。为了深入挖掘理论视角不一致的背后深层次原因,本部分需要探索政府支持与数字经济情境中其他主体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明晰其发挥持续双重价值创造效果的边界条件。

(3)数字用户。数字用户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性作用来驱动社会创业企业持续双重价值创造。较大的数字用户市场规模往往意味着社会创业企业进入数字经济的门槛较低,通过转变角色与数字用户互动来弥补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而促使持续参与社会创业活动(刘振等, 2021)。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越大的数字用户市场规模反映市场制度越健全,对社会创业需求也就越少,进而减少参与社会创业活动(刘志阳等, 2020; 徐虹等, 2020)。所以说,数字用户市场规模对社会创业企业持续双重价值创造可能存在积极和消极作用。

(4)高校及科研机构。高校及科研机构通过产学研的协同创新作用来驱动社会创业企业持续双重价值创造。高校及科研院所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核心主体,通过与数字经济中的社会创业企业进行适当互动过程,为这些企业提供数字创业项目的孵化基地、新颖的研究成果和数字化培养人才,进而激发社会创业发展的活力。然而高校及科研机构是否会对数字经济中社会创业企业持续双重价值创造产生积极影响依旧需要理论逻辑论证和企业实践结果检验。

(5)投资机构和创业服务机构。投资机构和创业服务机构通过多元化的创业服务作用来驱动社会创业企业持续双重价值创造。投资机构和创业服务机构被看作是激发社会创业活力的中介机构,能够帮助社会创业企业获取资金和人力等资源。在我国,为社会创业提供创业服务的主体类型比较多元化,既包括法律咨询和会计结算等非财务性支持,又包括资金支持来缓解企业资源约束(刘志阳等, 2020)。目前,中国社会投资机构依旧处于初创期,整体投资规模比较小,整个行业生态建设都不太规范,同时也缺少高效的社会创业资

源对接数字平台(彭伟 等, 2022)。

因此, 本研究提出命题 6: 驱动社会创业企业双重价值创造是一个动态多元的复杂过程, 是数字价值创造多主体因素协同互动作用的结果。即: 若想要实现社会创业企业持续双重价值创造, 需要同时关注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政府部门、数字用户、高校及科研机构以及投资机构和创业服务机构之间的协同互动作用。

4 理论建构

本研究将数字经济作为社会创业研究的重要情境, 在剖析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异质性情境独特性的基础上, 从资源编排理论、注意力基础观、合法性和数字价值创造理论视角出发解读社会创业者合理组合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异质性来开展社会创业活动的规律, 进一步揭示社会创业资源编排的微观机制, 落地社会创业研究。本研究的理论建构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 识别与提炼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维度和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过程, 丰富创业团队与数字技术交互层面的社会创业资源开发研究的理论框架。目前社会创业资源开发过程的研究主要探讨例如资源拼凑和资源优化等资源动员的战略, 其出发点为资源拼凑和资源优化被认为是突破资源开发困境的有效途径(厉杰 等, 2018; 刘振 等, 2019; 彭伟等, 2019; 卫田, 万倩雯, 2023)。然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不同文化背景、社会身份和知识经验的创业团队成员已经助力社会创业资源的开发(田莉 等, 2021; 尹珏林 等, 2022; 袁彦鹏 等, 2022)。本研究将社会创业资源开发过程研究扩展到创业团队与数字技术交互层面, 基于资源编排、注意力基础观、合法性和数字价值创造等理论视角, 通过构建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影响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过程的理论框架, 使创业团队与数字技术交互层面的社会创业资源编排关系图景更加丰富立体。

第二, 本研究将探索解释数字经济情境下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创业资源编排等创业行为的关键构念和可操作指标, 为创业资源管理研究丰富创业团队异质性微观知识基础。尽管有研究指出, 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创业企业资源之间的研究主要基于高阶理论、信息决策理论、社会分类理论、相似吸引理论、合法性理论和信

号理论等理论视角, 研究例如性别、种族和国籍等浅层文化异质性对创业者认知和创业企业资源等方面发挥着双刃剑效应(胡望斌 等, 2014; 马鸿佳, 唐思思, 郑莉莉, 2022; Xu et al., 2023)。本研究综合考虑数字经济情境下数字创业团队蕴含的深层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创业企业资源编排行, 通过系统梳理创业团队文化异质性和创业企业资源的有关成果, 进一步抽象和提炼关键构念、开发有关测量指标, 并利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检验其中的作用机制。一方面, 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对社会创业资源适用性和数字经济情境特殊性考虑的不足; 另一方面, 通过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等内容丰富现有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创业企业资源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

第三, 本研究融合资源编排和数字社会创业理论视角, 深化资源编排理论在数字社会创业情境下的作用逻辑和边界条件。现有资源编排理论研究领域主要基于数字经济情境下的商业创业企业, 从创业者因素、创业企业因素以及多主体因素等视角探讨如何影响着创业企业资源编排过程(张青, 华志兵, 2020; 王世权 等, 2022; 杨亚倩等, 2024; 马鸿佳 等, 2024)。目前资源编排过程研究主要立足于创业企业这一单一主体, 无法诠释多主体资源编排的动态过程, 需要深入挖掘例如合法性不足和双重价值冲突等社会创业企业资源编排过程的独特特征(刘志阳 等, 2023; 马鸿佳等, 2024)。本研究着重运用资源编排理论, 考虑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可供性和可再生性等特征, 将社会创业资源编排分为资源建构、资源捆绑和资源撬动三个阶段, 结合注意力基础观、合法性和数字价值创造理论视角分别探讨数字创业团队深层文化多样性的核心主体和例如政府部门、数字用户、高校及科研机构、投资机构和创业服务机构等支持性主体在社会创业资源编排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演化机制和动态演化过程, 为探索资源编排的数字社会创业情境和边界条件提供理论启示。

参考文献

- 蔡莉, 杨亚倩, 卢珊, 于海晶. (2019). 数字技术对创业活动影响研究回顾与展望. *科学学研究*, 37(10), 1816-1824.
- 陈良勇, 阮荣彬, 万文海, 林春培. (2022). 童年贫困经历对企业家社会创业导向的影响机制研究. *管理评论*,

- 34(3), 153-162.
- 陈昀, 陈鑫. (2018). 基于认知视角的社会创业企业合法化机制及获取策略. *管理学报*, 15(9), 1304-1310.
- 程江. (2017). 创业团队异质性和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综述. *外国经济与管理*, 39(10), 3-17.
- 仇思宁, 李华晶. (2019). 从个人创伤到社会创业: 基于亲社会性的多案例研究. *研究与发展管理*, 31(5), 77-88.
- 邓渝. (2021). “做正确的事与正确地做事”: 资源编排视角下的创业企业绩效. *外国经济与管理*, 43(5), 34-46.
- 葛笑春, 刘虎, 田雪莹, 葛登科. (2021). 多重制度逻辑下组织创业资源的识取——非营利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的案例研究.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14(2), 192-204.
- 何波, 陈晨, 张宏亮, 袁梦莎. (2020). 基于 BOP 战略的跨部门伙伴关系构建的案例研究.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13(1), 16-36.
- 胡望斌, 张玉利, 杨俊. (2014). 同质性还是异质性: 创业导向对技术创业团队与新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 *管理世界*, (6), 92-109.
- 贾建锋, 刘梦含. (2021). 数字创业团队: 内涵、特征与理论框架. *研究与发展管理*, 33(1), 101-109.
- 贾竣云, 陈寒松, 徐文箫, 田震, 朱晓红. (2023). 数字创业企业如何通过资源编排实现价值创造?——基于数字平台的跨案例研究. *研究与发展管理*, 35(5), 131-149.
- 厉杰, 吕辰, 于晓宇. (2018). 社会创业合法性形成机制研究述评. *研究与发展管理*, 30(2), 148-158.
- 厉杰, 孙瑞杰. (2020). 社会企业创立过程影响因素探究. *科学学研究*, 38(9), 1647-1653.
- 刘刚, 王泽宇. (2016). 创业团队文化多样性与互联网创业融资——基于产品众筹数据的实证分析. *财贸经济*, 37(6), 113-128.
- 刘景江, 王文星. (2014). 管理者注意力研究: 一个最新综述.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4(2), 78-87.
- 刘振, 丁飞, 肖应钊, 崔连广. (2019). 资源拼凑视角下社会创业机会识别与开发的机制研究. *管理学报*, 16(7), 1006-1015.
- 刘振, 肖应钊, 张玉利. (2021). 亲社会动机对社会创业双重导向的影响机理研究——市场化程度与工作经验隶属性的调节作用模型. *南开管理评论*, 24(2), 184-196.
- 刘志阳, 赵陈芳, 李斌. (2020). 数字社会创业: 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外国经济与管理*, 42(4), 3-18.
- 刘志阳, 赵陈芳, 邱振宇. (2023). 突发公共事件下的数字社会创新机制与模式——基于资源编排理论的视角. *管理工程学报*, 37(6), 32-45.
- 龙静, 郑松, 王乐. (2020). 创业团队异质性与创新: 战略共识和凝聚力的调节. *科研管理*, 41(12), 238-245.
- 马鸿佳, 林槌, 肖彬. (2022). 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多主体互动对数字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 fsQCA 方法的研究. *研究与发展管理*, 34(3), 41-53.
- 马鸿佳, 唐思思, 郑莉莉. (2022). 创业团队多样性对惯例更新的影响: 知识共享的中介和共享领导的调节作用. *南开管理评论*, 25(5), 75-86.
- 马鸿佳, 王亚婧, 苏中锋. (2024).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小制造企业如何编排资源利用数字机会——基于资源编排理论的 fsQCA 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27(4), 90-100, 208.
- 牛璐, 陈志军, 刘振, 徐鹏. (2023). 打破技术封锁: 逆机会与资源稀缺双困局下的大企业创业——基于资源拼凑与编排的纾解. *南开管理评论*, (7), 1-21.
- 彭伟, 殷悦, 沈仪扬, 毕玉. (2022). 创业生态系统如何影响区域社会创业活跃度?——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外国经济与管理*, 44(9), 121-134.
- 彭伟, 于小进, 郑庆龄, 祝振铎. (2018). 资源拼凑, 组织合法性与社会创业企业成长——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外国经济与管理*, 40(12), 55-70.
- 彭伟, 郑庆龄, 唐康丹, 赵栩. (2019). 社会创业企业资源拼凑行为的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南方经济*, 38(10), 90-101.
- 孙新波, 张媛, 王永霞, 孙浩博. (2021). 数字价值创造: 研究框架与展望. *外国经济与管理*, 43(10), 35-49.
- 田莉, 张劼浩, 袁国真. (2021). 创业团队身份异质性对团队冲突过程与结果的影响——基于团队断裂带的多案例研究. *管理评论*, 33(12), 324-338.
- 万倩雯, 卫田, 刘杰. (2019). 弥合社会资本鸿沟: 构建企业社会创业家与金字塔底层个体间的合作关系——基于 LZ 农村电商项目的单案例研究. *管理世界*, 35(5), 179-196.
- 汪建成, 林欣. (2021). 社会创业的资源整合过程——多案例研究.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14(2), 163-177.
- 王世权, 韩冬梅, 汪炫彤. (2022). 连续转型中高管团队注意力, 资源编排与战略更新——基于东软的案例研究. *南开管理评论*, 25(6), 183-194.
- 汪忠, 程铭. (2022). 农民社会创业者亲社会动机, 创业拼凑与创业绩效——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研究与发展管理*, 34(4), 127-140.
- 汪忠, 詹旋萍, 王爽爽. (2019). 社会创投, 资源获取与社会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财经理论与实践*, 40(1), 84-89.
- 卫田, 万倩雯. (2023). 基于社会资本的资源拼凑: 政府资助期后社会创业企业持续双重价值创造的机制. *管理世界*, 39(4), 100-119.
- 吴建祖, 龚敏. (2018).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 CEO 自恋对企业战略变革影响机制研究. *管理学报*, 15(11), 1638-1646.
- 吴建祖, 王欣然, 曾宪聚. (2009). 国外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现状探析与未来展望. *外国经济与管理*, 31(6), 58-64.
- 徐虹, 张妍, 翟燕霞. (2020). 社会创业研究回顾与展望. *经济管理*, 42(11), 193-208.
- 杨亚倩, 蔡莉, 詹天悦, 修斌. (2024). 机会集视角下数字平台企业资源编排过程研究. *科学学研究*, 42(10), 2150-2160.
- 尹珏林, 林星雨, 刘玉焕, 张晨. (2022). 联诤——共益杠杆的力量. *清华管理评论*, (Z2), 122-128.
- 袁彦鹏, 鞠芳辉, 刘艳彬. (2020). 二元价值平衡与社会企业创业策略——基于创业者身份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研究与发展管理*, 32(3), 36-49.
- 袁彦鹏, 鞠芳辉, 刘艳彬. (2022). 社会创业团队韧性从何而来?——基于单案例的探索性研究. *研究与发展管理*, 34(4), 97-111.
- 韵江, 赵宏园, 暴莹. (2022). 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资

- 源编排动态演化机制——基于猎聘的纵向单案例研究. *财经问题研究*, (3), 113–121.
- 曾楚宏, 李敏瑜. (2022). 创业团队异质对创业绩效的影响: 团队治理的中介作用. *科技进步与对策*, 39(14), 132–142.
- 张坤, 张秀娥. (2023). 社会创业活动驱动机制研究——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科技进步与对策*, 40(3), 1–9.
- 张明, 蓝海林, 陈伟宏. (2018). 企业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综述——知识基础, 理论演化与研究前沿. *经济管理*, 40(9), 189–208.
- 张青, 华志兵. (2020). 资源编排理论及其研究进展述评. *经济管理*, 42(9), 193–208.
- 张伟, 刘婷婷, 尹珏林, 李华晶. (2022). 社会创业者多元身份建构的心理机制研究. *研究与发展管理*, 34(4), 112–126.
- 赵慧娟, 陈洪洋, 姜盼松, 杨皎平. (2022). 平台生态嵌入, 数据赋能对中小制造企业创新柔性的影响——基于资源编排视角. *研究与发展管理*, 34(5), 1–15.
- 赵文红, 薛朝阳. (2017). 创业团队异质性, 认知合法性与资源获取关系研究. *管理学报*, 14(4), 537–544.
- 郑刚, 陈箫, 胡珊. (2022). 社会创业, 合法性构建与社会企业成长——基于深圳残友集团的纵向案例研究.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43(1), 124–137.
- 朱秀梅, 刘月, 陈海涛. (2020). 数字创业: 要素及内核生成机制研究. *外国经济与管理*, 42(4), 19–35.
- 朱秀梅, 杨珊. (2023). 数字创业生态系统多主体协同机制研究. *管理学报*, 20(1), 86–95.
- Amit, R., & Han, X. (2017). Value creation through novel resource configurations in a digitally enabled world.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1(3), 228–242.
- Battilana, J., Sengul, M., Pache, A. C., & Model, J. (2015). Harnessing productive tensions in hybrid organizations: The case of work integration social enterpri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6), 1658–1685.
- Estrin, S., Mickiewicz, T., & Stephan, U. (2013).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s: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na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7(3), 479–504.
- Estrin, S., Mickiewicz, T., & Stephan, U. (2016). Human capital in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1(4), 449–467.
- Finkelstein, S., & Hambrick, D. C. (1990). Top-management-team tenure and organizational outcom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anagerial discre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5(3), 484–503.
- Harrison, D. A., Price, K. H., Gavin, J. H., & Florey, A. T. (2002). Time, teams, and task performance: Changing effects of surface-and deep-level diversity on group function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5(5), 1029–1045.
- Hechavarria, D. M., Terjesen, S. A., Ingram, A. E., Renko, M., Justo, R., & Elam, A. (2017).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The impact of culture and gender on entrepreneurs' blended value creation goal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8(1), 225–257.
- Helfat, C. E., Finkelstein, S., Mitchell, W., Peteraf, M., Singh, H., Teece, D., & Winter, S. G. (2009). *Dynamic capabilities: Understanding strategic change in organizations*. John Wiley & Sons.
- Hockerts, K. (2017). Determinants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1(1), 105–130.
- Hoogendoorn, B. (2016). The preval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t the macro level.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54(S1), 278–296.
- Hörisch, J., Kollat, J., & Brieger, S. A. (2017). What influences environmental entrepreneurship?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entrepreneurs' environmental orientation.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8(1), 47–69.
- Jehn, K. A., Northcraft, G. B., & Neale, M. A. (1999). Why differences make a difference: A field study of diversity, conflict and performance in workgroup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4(4), 741–763.
- Lazzarini, S. G. (2020).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firm: Alternative organizational forms for social value creation and appropri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5(3), 620–645.
- Ocasio, W. (1997). Towards an 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8(S1), 187–206.
- Saebi, T., Foss, N. J., & Linder, S. (2019).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romis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45(1), 70–95.
- Saud Khan, M., J. Breitenacker, R., & J. Schwarz, E. (2014). Entrepreneurial team locus of control: Diversity and trust. *Management Decision*, 52(6), 1057–1081.
- Sirmon, D. G., Hitt, M. A., & Ireland, R. D. (2007). Managing firm resources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to create value: Looking inside the black box.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1), 273–292.
- Sirmon, D. G., Hitt, M. A., Ireland, R. D., & Gilbert, B. A. (2011).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Breadth, depth, and life cycle effec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37(5), 1390–1412.
- Stephan, U., Uhlaner, L. M., & Stride, C. (2015).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voids,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6(3), 308–331.
- Stevens, R., Moray, N., Bruneel, J., & Clarysse, B. (2015). Attention allocation to multiple goals: The case of for-profit social enterpris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6(7), 1006–1016.
- Triana, M. D. C., Kim, K., Byun, S. Y., Delgado, D. M., & Arthur Jr, W.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deep-level diversity and team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of the main effect, moderators, and mediating mechanism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58(8), 2137–2179.
- Wernerfelt, B. (1984). A resource - based view of the firm.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5(2), 171–180.

- Williams, K. Y., & O'Reilly III, C. A. (1998). Demography and diversity in organizations: A review of 40 years of research.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 77–140.
- Xu, Z., Li, B., Liu, Z., & Wu, J. (2022). Previous military experience and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poverty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Management Decision*, 60(7), 1969–1989.
- Xu, Z., Tang, Y., & Liu, Z. (2023). Buddhist entrepreneurs, managerial attention allocation, and new ventures' access to external resourc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60(2), 454–494.
- Zeng, J., Yang, Y., & Lee, S. H. (2023).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nd scaling-up of platform-based entrepreneurial firms: The logic of dialectic tuning.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60(3), 605–638.
- Zhao, E. Y., & Lounsbury, M. (2016). An institutional logics approach to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Market Logic, religious diversity, and resource acquisition by microfinance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1(6), 643–662.
- Zimmerman, M. A., & Zeitz, G. J. (2002). Beyond survival: Achieving new venture growth by building legitima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7(3), 414–431.

“Do right things” and “do things right”: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team deep-level cultural diversity on social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

XU Zuhui¹, ZUO Mingyue¹, ZHOU Yan², LIU Zhiyang³

(¹ Research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23, China) (² School of Economics, Jiaxing University, Jiaxing 314001, China)

(³ China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so that the composition of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team is more open, but the manifestation of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team deep-level cultural diversity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n the process of social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orchestration have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and verified. This study carries out four sub-studies: the unique connotation and key dimensions of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team deep-level cultural diversity are explored in the Chinese context; based on the attention-based view, the research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that how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team deep-level cultural diversity influences social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structuring; in view of legitimacy perspective,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team deep-level cultural diversity on social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 bundling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bundling mode and tim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value creation, this research discusses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deep-level cultural diversity of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team to leverage social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core and supporting subjects. Based on the process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heory,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team i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effectiveness. Specifically, entrepreneurs' attention,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legitimacy mechanisms provide the resource structuring and bundling process that indicates the strategic goal matching of enterprises, and encourage the social enterprise to “do right things”; The synergy interaction of supporting-agents mechanism provides the resource leveraging process that standardizes the efficient use of resources, and ensure the social enterprise “do things right”.

Keyword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ource mobilization strategy, deep-level culture diversity, digital entrepreneurial team, resource orchestration